

# 宁波地区汉晋时期开发历程的考古学研究

许超 张华琴

**【提要】**: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宁波地区汉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从多个方面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概况而言,这一时期宁波地区的开发,是一个在越人传统聚居区上,以县级治所为中心,以水系为交通线,由山区向平原推进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人口的迁徙发挥了重要作用,继承、吸收、融合与创新是这一进程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 宁波地区 汉晋时期 开发历程 考古学研究

宁波地区东濒大海,北临杭州湾,西部是会稽、四明山系,东南为天台山余脉,余姚江、奉化江各自穿过狭长的谷地,在市区三江口交汇,与周边水网形成了广袤的三江平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明发展历程。

汉晋时期是宁波地区全面融入汉化文明圈的起点,这一进程如何推进,有何特征,又有哪些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从考古学角度的解读。近年来,宁波地区在汉晋时期的聚落、墓葬考古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sup>①</sup> 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考古材料的考察,为我们深入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提供新的思考和启发。

## 一、宁波地区汉晋时期考古遗存的基本面貌

汉晋时期,宁波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在考察汉晋时期宁波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先秦时期宁波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概貌:

先秦时期,宁波地区主要为越人生活的家园。《国语·越语上》提到:“句践之地,南至于句吴,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sup>②</sup>;《吴越春秋》记载,句践受释归越后,吴王“增之以封,东至于句甬,西至于携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sup>③</sup>;《后汉书·藏洪传》章怀太子在注文中引《十三州志》云:“句践之地,南至句无,其后并吴,因大城句余,章伯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sup>④</sup>。这里出现的“鄞”、“句甬”、“句章”都位于宁波地区,是历史文献中保留下来的较古老的汉译古越语地名。越人的居住环境,一般选择在山地的坡麓地带,鄞州钱岙遗址<sup>⑤</sup>和镇海九龙湖鱼山遗址<sup>⑥</sup>是这一时期典型的越人居住址。越人的居住习惯沿袭了自河姆渡以来干栏式木构建筑的传统,而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他们传统的墓葬形式。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杀越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sup>⑦</sup>。公元前306年,楚怀王灭越<sup>⑧</sup>。楚虽灭越,但宁波地区仍当为越人栖息之所,楚未必能施行有效的统治。直至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sup>⑨</sup>,宁波地区才最终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楚文化的东渐,越文化的退缩,在考古学文化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从战国中晚期开始,宁波地区传统土墩墓、石室土墩墓迅速被楚式风格的土坑墓所取代。

汉晋时期宁波地区的考古遗存主要分为聚落遗址和墓葬两类。聚落遗址又可依规模大小、等级高低分为城址和一般的普通聚

<sup>1</sup>作者:许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博士研究生;张华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宁波 315000)

① 王结华、褚晓波:《宁波地域考古的回顾与展望》,《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王结华、王力军、丁友甫:《新世纪宁波考古新发现》,《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2年。

落。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今宁波地区在汉代西汉时期设置有余姚、句章、鄞、鄮四县,此四县均设置于今甬江流域。光绪《余姚县志》载,余姚县城为孙吴朱然所筑,故城在余姚江北,今县城东,稍有迁徙。<sup>⑨</sup>宝庆《四明志》载:“今奉化县东五十里有广福院,旧名鄞城院,初鄞县治也。慈溪县南十五里句余山之东,有城山,初句章县也。鄞县东三十里,阿育王山之西,鄮山之东,有古鄞城,初鄞县治也”<sup>⑩</sup>。从空间分布来看,句章县位于西北、鄞县居南、鄮县居东,此三县互成犄角,而余姚位于余姚江上游,扼守通往上虞、山阴的孔道。如此布局,即能够全面控制甬江流域,又可以掌控与山阴县城(会稽郡城)的交通,十分合理。

宁波地区平原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两汉时期县城平均约每1000平方公里一座。安徽淮北地区地处黄淮平原,汉代县城平均约每1103平方公里一座。<sup>⑪</sup>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青、徐二州是两汉时期城市分布最为稠密的区域,也只是平均约每1000平方公里分布一座。<sup>⑫</sup>黄河下游及黄淮一带,都是两汉时期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从县城的设置情况来看,宁波地区县级行政区的设置密度并不低于这些区域。

余姚、句章、鄞、鄮四县,目前仅对句章故城开展过考古工作,考古工作显示,以梯形水网合围而成的城址范围约27万平方米<sup>⑬</sup>。

---

<sup>2</sup> ①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20《越语上》,中华书局,2002年,第570页。

②[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卷8《句践归国外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9、130页。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58《藏洪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1884页。

④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波钱岙商周遗址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

⑤雷少:《揭开宁绍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新图卷——宁波镇海九龙湖鱼山遗址Ⅱ期发掘与乌龟山遗址试掘的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5年3月13日第8版。

⑥[汉]司马迁:《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751页。

⑦李学勤:《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

⑧[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页。

⑨[清]孙德祖等撰:光绪《余姚县志》卷3《城池》,《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〇〇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据光绪二十五年刊本影印,第105页。

⑩[南宋]罗濬、方万里撰:宝庆《四明志》卷12《鄞县志》卷1《叙县·沿革论》,《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3348—3349页。

⑪张南、张宏明:《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学术界》1991年第6期。

⑫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据徐龙国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秦汉城邑的研究,两汉时期句章县城的面积规模勉强可纳入小型县邑城,略大于特小型县邑城。<sup>①</sup>依据汉制,大县设令,小县置长,而“荆扬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县令而”<sup>②</sup>。可见余姚、鄞、鄮三县,其规模应与句章相当,在当时皆为小型县邑。

典型的汉代城址,如晁错在上书建议内地百姓移民边地中所言:

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合,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立城邑,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然后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家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sup>③</sup>

晁错所言,可谓汉代城市选址、建设的规划指南。城市的建设首先要考察地理环境是否宜居,然后“营立城邑,制里割宅”,城外则要“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给人整齐划一之感。然而晁错所指毕竟是针对北方边地,淮南王在上书武帝时也曾提到:“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簧竹之中”<sup>④</sup>。余姚、句章二县,处于余姚江畔,临水而建,分别处于姚江谷地的首尾两端,而鄞、鄮二县,依山而筑,皆位于天台山余脉与鄞奉平原交界地带的山谷间。两汉时期宁波地区城邑的选址,更接近淮南王所言越人的居住特征。

在对句章故城的考古发掘中,依然发现有干栏式木构建筑遗存,但城内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板瓦、筒瓦以及云纹、人面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在今宁波市西门口汉代聚落遗址与西河街汉代遗址中,也发现有砖砌墙基、水井等遗迹,出土了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sup>⑤</sup>这说明当时人们的居住状态已经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干栏式木构建筑,汉地砖瓦式房屋已为人们所接受。句章故城周边水网密布,考古工作并没有发现显著的城墙遗迹,推测环城址周边的河道与临近的山地是城址的主要防御设施,<sup>⑥</sup>这应该也与当地越人传统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方式有关。

据统计,宁波地区汉晋时期墓葬已发掘近千座,资料披露较为详尽的有近300座。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一时期的墓葬依然主要分布在山麓坡地,但分布范围相较与先秦时期已大大扩展。在今宁波市周边的祖关山、乌龟山、湾头、周宿渡等平原中的孤丘山地,也发现了大批这一时期的墓葬。从数量上看,可明确归属为西汉早中期的墓葬仅寥寥数例,这一现象在同处钱塘江南岸的绍兴地区也是如此,以至于让人发出“汉初无墓”之叹。西汉晚期以来,墓葬数量则显著增多。从墓葬的形制来看,竖穴土坑墓流行于西汉一代;从新莽时期开始至东汉中期,宁波地区则短暂流行过土坑砖椁墓;东汉晚中期,砖室券顶墓迅速普及,取代土坑墓而成为当地墓葬的主流形制;孙吴、两晋时期,宁波地区的墓葬形制延续了砖室墓的传统,依然以中小型墓葬为主。墓葬平面形制上虽无大的改变,但在细节上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如墓室内出现棺床、祭台等功能设施,墓壁上也开始出现直棂假窗、壁龛等装饰性结构等。同时,这一时期的墓葬中纪年材料显著增多,墓砖铭文、纹饰丰富多样。从随葬器物组合来看,西汉早中期墓葬中主要随葬

<sup>⑬</sup>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

<sup>3</sup> ①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6、137页。

②[汉]应劭:《汉官仪》,见清孙星衍校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53页。

③[汉]班固:《汉书》卷49《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88页。

④[汉]班固:《汉书》卷64《严助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8页。

⑤林士民:《三江变迁——宁波城市发展史话》,宁波出版社,2002年,第16、17页。

⑥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7—150页。

仿铜礼器的鼎、盒、壶组合,而质地上又有泥质陶和硬釉陶(原始瓷)两类。硬釉陶类礼器组合甫一出现,便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苏、浙、沪、皖一带流行开来;西汉晚期以来,仿铜礼器组合趋于衰落,硬陶、釉陶类壘、罐,陶灶、釜等模型明器以及铁剑、刀、釜等铁质器具开始流行;及至东汉中期,成熟青瓷器开始出现,井、灶等模型明器,杯、盘等祭奠类器具以及反映精神信仰生活的五联罐等器物逐渐增多;孙吴、两晋时期,墓葬的随葬器物中青瓷器成为主流,随葬器形品类更为繁多,以壶、罐、碗、盏、杯、盘等生活用具为主,砚台、滴水、黛板等文房用具,井、灶、鸭笼、狗圈等模型明器,以及堆塑罐、文吏俑、侍女俑等也较为常见。

## 二、相关问题的讨论

谭其骧先生曾指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sup>①</sup>西汉以来,甬江流域即设置余姚、句章、鄞、鄮四县,并保持了长时期的稳定。东晋永和三年(347),在南部山区析鄞县置宁海县,属临海郡。<sup>②</sup>较之甬江流域,今宁海、象山一带所在的南部山区,其大规模的开发进程又迟滞了五百余年。

汉代丧葬礼俗中,以车载棺柩,丧车所过,街路有祭、丧家婚友送葬至丧所、又有上冢祭祀之礼。<sup>③</sup>这些丧葬礼仪活动表明,汉代墓葬选址应该不会距离人们居住地太远,因此墓葬的空间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聚落的空间分布状态。韩国学者金秉骏对江苏、山东、湖南、湖北、四川五省两汉时期墓葬与县城间的距离做过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西汉时期此五省墓葬群距离县城的平均距离约4.3公里,相当于步行约1小时里程;东汉时期此五省墓葬群距离县城的平均距离约11.5公里,相当于步行约3小时里程。<sup>④</sup>我们将历年来宁波地区发现的汉晋时期墓葬在地图上标示出来,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也位于以余姚、句章、鄞县、鄮县县治所在地为中心的半径12公里的范围内。如果我们将先秦时期所发现的各类考古遗存也叠加进去,会进一步发现,先秦时期在余姚江流域以余慈山地北麓为中心的区域,和处于余姚江谷地末端以句章故城遗址为中心的区域,在汉晋时期仅略有扩张;汉晋时期南部山区与平原交界地带以白杜为中心的区域、东北山区与平原交界地带以五乡为中心的区域,则是基本由先秦时期以钱岙遗址为中心的区域扩展而来。

受史前时期海侵的影响,宁波地区形成了大量的由泄湖转化而来的淡水湖。<sup>⑤</sup>至少在秦汉时期,今天的宁波平原还是湖泊与水网交织的水乡泽国,其开发的难度主要在于“山洪泛滥”和“咸潮顶托”的影响。<sup>⑥</sup>这种情况下,平原地区的孤丘山地与山区的山前坡地,就成为人们不断拓殖生产的跳板。乐祖谋先生在对历史时期宁绍平原城市起源的研究中,也曾指出了这些孤丘山地的“支点”作用。<sup>⑦</sup>历史上,今市区三江口周边就分布有不少类似的孤丘山地,汉晋遗址与墓葬也密集分布于此。此外,洞桥、鄞江一带的山前台地也发现有较多的吴晋墓葬。这表明汉晋以来应该有着一一条沿余姚江、奉化江、鄞江等水系进行的开发路线;而在以五乡为中心的区域内部,姚墅一带发现的墓葬也多为两晋墓葬,应该也存在着一一条沿着小浃江进行的线路(图一)。

<sup>①</sup> 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sup>②</sup>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6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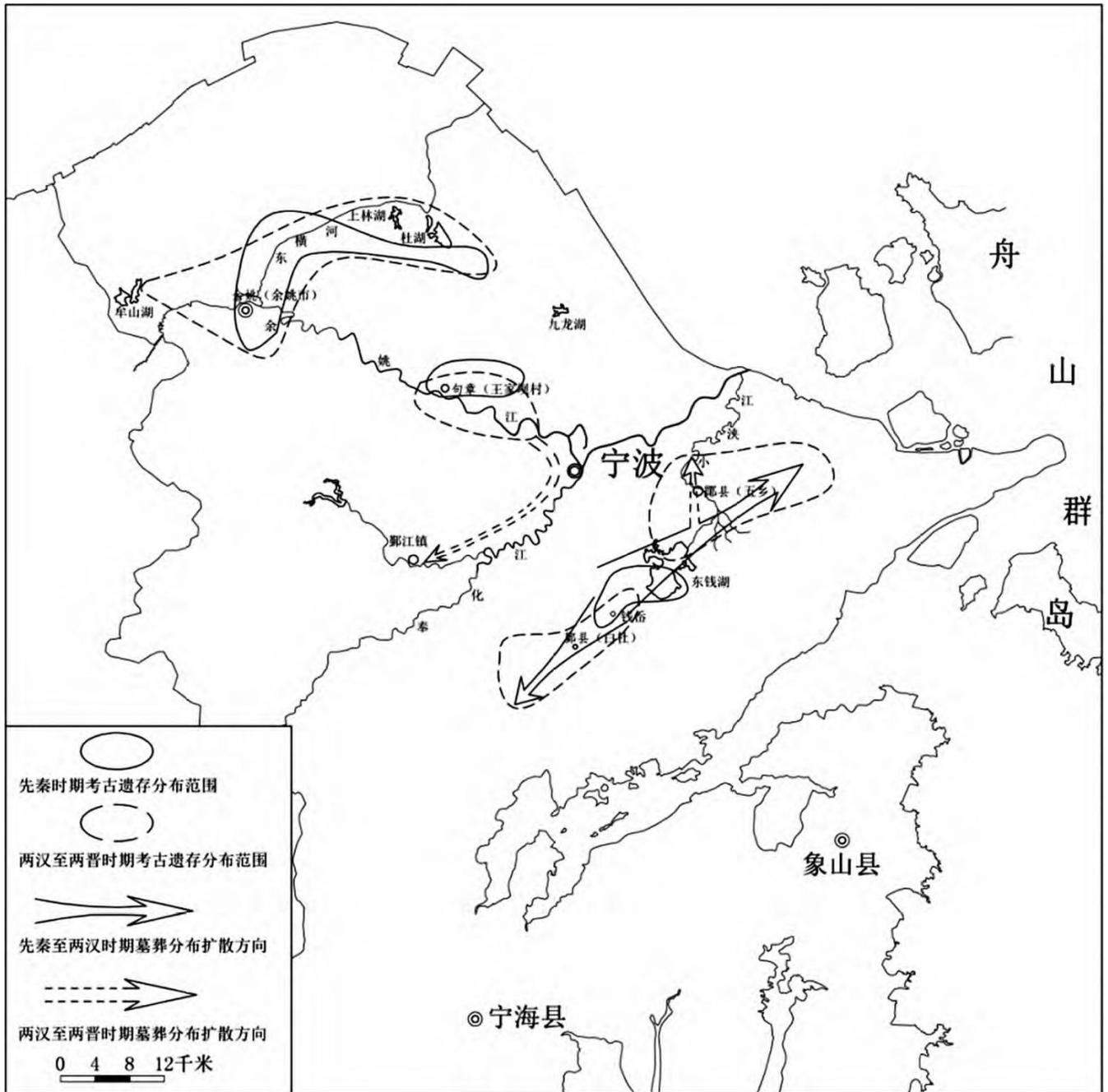
<sup>③</sup>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二章《丧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sup>④</sup> [韩]金秉骏:《汉代聚落分布的变化——以墓葬与县城距离的分析为线索》,《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

<sup>⑤</sup> 陈桥驿、吕以春、乐祖谋:《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地理研究》1984年第3期。

<sup>⑥</sup> 曹屯裕:《浙东文化概论》,宁波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sup>⑦</sup> 乐祖谋:《历史时期宁绍平原城市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2期。



图一 先秦至汉晋时期宁波地区考古遗存空间分布变化示意图

秦在平定江南实现全国统一后，“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口故郛。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sup>①</sup>，“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sup>②</sup>。这表明秦代曾将宁绍一带的越人迁徙到浙西、皖南一带，又将“天下有罪吏民”发配到大越中心。这一举动固然加速了中原文化与传统越地文化的融合，但将当地越人大规模的外徙也导致了宁绍一带人口的锐减。在宁波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中，秦至西汉中期的墓葬数量极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一事实。汉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sup>③</sup>。辛德勇先生指出，此次向会稽地区移民不仅是为了安置灾民，也有巩固东南边防的战略意图。<sup>④</sup>此后不久的元鼎六年，为讨伐东越，武帝便“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

方往”<sup>55</sup>。此次徙民中所指的“会稽”地域广大，能够落户到今宁波地区的数量已不可考，但哪怕极少数量的移民徙入，也势必会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西晋末年，中原板荡，王室偏安，大量的北方民众也随之徙居江南。在这一过程中，流寓而来的北方贵族往往占据山泽，以为私产。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南朝士族以别墅为名占领山泽是一个普遍状态，我们现在还可以找到很多地名某墅的村镇，有一些还可以追溯到命名的由来”<sup>①</sup>。近年来在北仑姚墅一带多次发现了两晋以来的纪年墓葬，其中墓主身份可考者有“晋故都尉”<sup>②</sup>，应该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映。北方移民的迁入，不仅带来了人口，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都极大促进了当地的开发进程。

西汉初期至东汉中期，宁波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虽然在数量上显著增多，但从形制上看却均为中小型墓葬，随葬器物的组合也比较一致。这表明虽然当时的人口质量与社会生产已经有了一定的复苏，但社会阶层也还相对均质单一。《史记·货殖列传》载：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sup>③</sup>

考古发现的情况与司马迁的描述相比，还是较为一致的。到了东汉晚期，宁波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墓葬，如在奉化白杜发现的“熹平四年”墓就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墓葬内出土的金银器、青瓷器等随葬品，显示出了墓主人生前奢侈的生活，出土的“一直(值)二万”的买地券也反映了当时土地买卖关系在社会的普遍认同<sup>④</sup>。此类较高等级墓葬的出现，表明了当时的社会阶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此外，在宁波地区两晋时期墓葬出土的铭文砖中，还发现有不少职官铭文，可考者有“都船”、“郎中”、“司监吏”、“都尉”、“户曹”等<sup>⑤</sup>。东汉时期，“都船”为执金吾属官，与两晋时期“郎中”一职，均堪称清美。“都尉”一职进入两晋，职权虚化。“户曹”、“司监吏”，应该均为当时地方事务官。这些职官的出现，也为我们认识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东汉晚期以来，余姚虞氏族人重文修武，投身政治，逐渐成为六朝时期宁波境内家族规模最大、政治地位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世家大族<sup>⑥</sup>。余姚虞氏家族崛起，也成为了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向士族演变的典型。

战国晚期以来，宁波地区发掘的墓葬中随葬的泥质陶器组合，如鼎、豆、壶、盒、杯等器，与湖南长沙等地战国楚墓中的陶礼器组合相似<sup>⑦</sup>，句章故城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部分泥质陶器，以及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也带有鲜明的楚式风格<sup>⑧</sup>。而宁波地区传统越人墓葬中主要随葬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器，这表明了战国中晚期以来，楚文化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宁波地区。但同时在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发掘的几座竖穴土坑墓中，随葬器物的组合情况则复杂的多。其中M10随葬器物基本组合为原始瓷壶、印纹硬陶罐；M14随葬器物组合则可分为两套，一套为原始瓷鼎、甗、壶组合，一套为泥质陶鼎、盒、壶、钫、豆组合<sup>⑨</sup>。显然，原始瓷、印纹硬陶类组合在质地上坚守了越地的传统，但在形式上又采用了当时流行的组合方式。近年来，有学者将这些两汉时期在江东地区烧造、以高温钙釉器为特点并广为流传的陶瓷产品归纳为“江东类型陶瓷器”<sup>⑩</sup>，以“江东类型陶瓷器”为代表的地方特色器物群的扩散传播，以

<sup>5</sup> ①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卷8《外传记地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4页。

②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卷2《外传记吴地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③[汉]班固：《汉书》卷64《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78页。

④辛德勇：《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⑤[汉]司马迁：《史记》卷114《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82、2983页。

<sup>6</sup> ①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②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市北仑博物馆：《浙江宁波北仑凤凰山两晋纪年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3年第3期。

及东汉以降成熟青瓷的烧制成功,正体现了在这一进程中地方文化的传承与活力。

西汉晚期以来,宁波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数量及随葬的铁质器具逐渐增多。铁质农具的普及,表明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使得水利事业的开展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水利事业的兴修主要集中在句章县境内,《晋书·孔愉传》载“句章县有汉时旧陂毁废数百年,愉自巡行,修复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sup>①</sup>,又“杜湖广凡三千七百余亩,白洋湖广凡一千七百亩,茹纳众山之水,肇自汉时”<sup>②</sup>,这些都表明了汉晋时期句章县境内曾开展过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陆云在《答车茂安书》中曾这样描述鄞县的社会经济状况:

(鄞)县去郡治,不出三日,直东而行,水陆并通。西有大湖,广纵千顷,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汎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遇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刀耕水种,不烦人力。决泄任意,高下在心,举钺成云,下铍成雨,既浸既润,随时代序也。官无通滞之谷,民无肌乏之虑,衣食常允,仓库恒实。<sup>③</sup>

在陆云笔下,兴修陂塘已成常态,而“燔茂草以为田,刀耕水种”实际上就是“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张学锋先生曾指出,东汉及六朝时期的“火耕水耨”是南方水稻种植区防虫取肥与中耕除草的两项基本农活,是一种相当精细的耕作方式,而非通常意义上原始粗放的耕作<sup>④</sup>。总之,在陆云的描述中,当时在鄞县铁质农具已普遍运用,水利工程不断开展,耕作方式也相当精细,整个社会官殷民实,简直就是人间乐土。尽管其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也反映出此时宁波地区的社会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成长,甚至有了“昔之关中”之誉<sup>⑤</sup>。

### 三、结语

以上我们从考古遗存所能反映出的空间分布变迁、社会阶层分化、文化因素传播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结合文献记载,讨论了汉晋时期宁波的开发历程。概况而言,这一时期宁波地区的开发,是一个在越人传统聚居区上,以县级治所为中心,以水系为交通线,由山区向平原推进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人口的迁徙发挥了重要作用,继承、吸收、融合与创新是这一进程的基本特征。当然,我们对这一时期宁波地区的开发程度也不可过于高估,刘宋大明初,孔灵符上表“徙(山阴)无费之家于余姚

---

③[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④王利华、林士民:《奉化白杜汉熹平四年墓清理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⑤“郎中”、“都船”、“司监吏”三例,见王莲瑛《从余姚地区出土的随葬品来看西晋时期的厚葬之风》,《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都尉”一例,见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市北仑博物馆《浙江宁波北仑凤凰山两晋纪年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3年第3期;“户曹”一例,为奉化市文保所内部资料。

⑥余姚虞氏家族的事例,主要见于《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晋书·虞潭传》、《晋书·虞预传》、《晋书·儒林·虞喜传》等。

⑦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瓷器——兼谈原始青瓷生产和使用中的若干问题》,《文物》1982年第4期。

⑧王结华、许超、张华琴:《句章故城若干问题之探讨》,《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

⑨陈元甫:《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⑩杨哲峰:《输入与模仿——关于〈萧县汉墓〉报道的江东类型陶瓷器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3年第1期。

---

、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并成良业”<sup>⑦</sup>,这说明了及至刘宋,宁波地区依然具备接纳移民的条件。汉晋时期宁波地区的开发进程虽然缓慢,但毕竟是全面融入汉文化文明圈的起点,通过不断累积,最终为唐宋时期宁波地区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sup>7</sup> ①[唐]房玄龄:《晋书》卷78《孔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53页。

②[明]颜鲸:《重清杜白二湖永赖碑记》,见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外编》,中华书局,1998年,第715页。

③[晋]陆云撰,黄葵点校:《陆云集》卷10《答车茂安书》,中华书局,1988年,第175页。

④张学锋:《六朝农业经济概说》,胡阿祥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187—196页。

⑤[唐]房玄龄:《晋书》卷77《诸葛恢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2页。

⑥[梁]沈约:《宋书》卷54《孔季恭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3页。